第 57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7, No.6
2020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20

经 济 学 研 究

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龚六堂　林东杰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不仅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资源错配是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原因,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在于降低生产要素的错配程度。文章基于异质性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对造成资源错配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通过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源错配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错配;资源配置效率;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 0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6-0105-08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保持了年均超过 9%的经济增长率。经过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逐渐显现。另一方面,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需求疲软。这使得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①表明,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并且是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动力。因此,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资源在不同部门或企业间的配置效率将会影响宏观经济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将从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此,如何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章首先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内涵。文章梳理资源错配理论的文献,从理论上分析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渠道,阐明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和相关的研究,对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对如何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以 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将经济增长分解为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投

收稿日期:2020-09-10

作者简介:龚六堂,男,湖北监利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项目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9ZDA069)。

① Solow, Robert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1): pp. 65-94.

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被定义为不能由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解释的经济增长的部分。根据 Solow 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差异解释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差异。Mankiw et al.(1992)①在标准的 Solow 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通过对跨国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扩展后的 Solow 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跨国收入差距。大量后续研究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跨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 1997②)。

大量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探究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些研究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低。例如,Young(2003)③认为由于人口增长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所带来的劳动力要素的增加和资本积累是主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适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Zhu(2012)④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 1978 年至 2007 年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78%。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初期,如果收入水平比较低,那么经济将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随着收入水平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逐渐下降。这是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逐步下降。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归结为外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并没有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将其视为外生的,并且通常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技术进步。因此,随后的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就在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主要的理论文献有 Romer(1990)⑤等。但是,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理论一般假设代表性经济,因此不存在厂商的异质性,从而忽略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厂商之间配置下对加总 TFP 的影响。又或者通过假设市场是完备的,从而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也就忽略了资源配置对 TFP 的影响。因此,2000 年以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和研究要素配置效率对 TFP 的影响。

传统的增长理论先验地假设了要素总是能够按照等边际生产率原理进行配置,因此不存在资源错配。然而,现实中资源错配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忽略资源错配可能导致我们不能真正理解 TFP 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现实中大量的市场不完备和市场摩擦会导致资源错配。例如,厂商往往面临借贷约束,如果生产率较高的厂商由于借贷约束不能融资进行投资,从而投资项目无法实现。与此同时,生产率较低的厂商不存在借贷约束进而得到更多的资本进行过度投资。那么,在加总层面将会造成 TFP 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正是由于资本要素的错配造成的。除此之外,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以及不同地区间的运输成本等因素都会阻碍要素的流动,导致资源错配。更一般的,制度因素也可能导致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差异。

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种渠道,即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一般

---

① Mankiw, N. Gregory, David H. Romer, and David N. Weil.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2): pp.407-37.

② Klenow, Peter J., and Andrés Rodríguez-Clare. 1997.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Growth Economics: Has It Gone Too Far?"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2: pp.73-114.

③ Young, Alwyn. 2003.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 (6): pp.1220-1261.

④ Zhu, Xiaodong. 2012. "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 (4): pp.103-24.

⑤ Romer, Paul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Part 2): pp. S71-S102.

来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更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更高,但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中,市场不完备和市场摩擦的程度更高,从而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更低。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研究资源错配的原因以及什么因素导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更加重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就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三、资源错配理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理论之所以没有考察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因为这些理论大都假设单部门经济或者代表性经济。单部门经济模型忽略了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效率,代表性经济模型则忽略了个体异质性。如果存在个体异质性,即使是在单部门经济中也可能存在资源错配,从而导致 TFP 损失。最近的研究开始从异质性的角度出发,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资源错配如何影响 TFP 进行分析。宏观经济理论对于资源错配的研究主要采用异质性厂商模型和多部门宏观模型两种框架。

(一)异质性厂商模型与资源错配

异质性厂商模型通常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连续统的异质性厂商,每个厂商都具有个体异质性的技术水平。首先每个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然后再加总到宏观层面达到一般均衡。异质性厂商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厂商决策行为,并且利用微观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分析。许多文献基于异质性厂商模型对资源错配问题展开研究。

Hsieh and Klenow(2009)①基于异质性厂商模型,提供了一个测度资源错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框架。他们将代表市场摩擦的楔子(Wedge)加入模型中,不同厂商面临的楔子不同。这造成了不同厂商的边际产出价值不同,从而要素不能按照等边际产出原理进行配置。经济中出现资源错配,导致加总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下降。Hsieh and Klenow(2009)以美国制造业为基准,利用中国 1998-2005 年和印度 1987-1994 年的制造业数据,考察了制造业行业内由于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错配导致的 TFP 效率损失,他们的结果表明如果能够实现美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水平,则中国的 TFP 水平将增加 30%-45%,印度的 TFP 水平则将增加 40%-50%,从而产出将增加 1 倍。同时他们发现,在中国的样本内,由于国企改革等措施,资源配置效率有所上升。但是,印度的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明显改善,这与印度的 TFP 变化趋势相符合。

Hsieh and Klenow(2009)的研究是一个核算资源错配的框架,但是他们并没有回答造成资源错配的具体因素是什么。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②指出,需要对影响资源错配的具体来源进行研究,以分析它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下面分别对几种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因素进行论述。

第一,税收、成本加成与资源错配。税收和成本加成可以看作是造成效率的楔子的具体形式。通过对税收和成本加成进行具体的刻画,可以分析它们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在一个具有资本积累的异质性厂商模型中讨论了由于税收/补贴政策造成的扭曲和效率损失。不同的厂商面临的税率不同,税率的差异造成了要素在不同厂商间的错配。他们以美国经济作为样本进行校准,结果表明政策造成的资源错配将导致总产出和加总 TFP 水平下降 30%—50%。Guner et al.

---

①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pp.1403-1448.

② Restuccia, Diego and Richard Rogerson. 2008. "Policy Distortions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with Heterogeneous Establishment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1 (4): pp.707-720.

(2008)①研究了依赖规模的政策如何影响资源错配,他们从有效税率入手,因为有效税率依赖企业的规模。他们分别以印度制造业、日本零售业和意大利的就业保护政策为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规模减少 20%将使得产出减少超过 8%。

Epifani and Gancia(2011)②考察了在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下,由于成本加成的异质性分布导致的资源错配。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贸易开放可能使得某些行业的垄断扭曲加剧,从而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导致福利损失。这表明贸易自由化和国内产业政策是互补的,适当的政策干预可以改善均衡配置。

第二,厂商进入/退出和资源错配。Barseghyan and DiCecio(2011)③在一个包含内生进入决策的异质性厂商模型中考察了异质性的进入成本对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技术水平高的厂商可能由于面临着过高的进入成本而选择不进入市场,从而导致了资源错配。他们认为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行业进入阻碍很大,使得企业的进入成本占收入的 32%到 78%。低效率的企业由于各种制度、市场保护和财政补贴等原因能获得低成本的生产要素,从而出现过度投资,高效率的企业由于进入成本太大无法进入行业,从而不能实现投资,进而导致经济中的效率损失。他们利用企业注册登记费用表示进入成本,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进入成本能够解释很大一部分的跨国人均收入和 TFP 的差异。他们发现进入成本增加 1%,TFP 损失 0. 52%,从而可以解释 25%的 TFP 的差异,并且进入成本最低和最高的国家相比较,两者的人均收入和 TFP 分别相差 1. 52 倍和 1. 32 倍。一个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或者市场越不完全则行业的资源错配的程度越高从而 TFP 效率越低。

第三,金融摩擦和资源错配。金融摩擦是一种重要的市场摩擦的形式。金融摩擦通过影响厂商的投资和资本积累行为,对宏观经济有重要的影响。许多研究从金融摩擦的视角出发,考察资源错配的问题。Midrigan and Xu(2014)④在将异质性的借贷约束引入了异质性厂商模型,金融摩擦异质性导致了资本错配。基于数据进行校准,他们发现金融摩擦异质性不能造成的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并且厂商的进入和退出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的主要因素。在类似的框架下,Moll(2014)⑤讨论了相同的问题。Moll(2014)的研究表明,厂商异质性技术冲击的持续性对于资源错配程度有重要的影响。较高的技术冲击持续性使得厂商能够通过自融资的方式缓解金融摩擦造成的资本短缺。Moll(2014)基于不同的校准发现金融摩擦会带来比较大的 TFP 损失。

实证研究方面。如前所述,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错配情况可能更加严重,造成 TFP 效率损失更大。Galindo et al.(2007)⑥利用发展中国家数据考察了金融自由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利用资本配置效率指数,他们发现金融自由化提升了资本配置效率减少了资本错配。

第四,信息与资源错配。除了以上几种具体的市场摩擦的形式,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也是造成

① Guner, Nezih, Gustavo Ventura, and Yi Xu. 2008.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Size-Dependent Policie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1 (4): pp.721-744.

② Epifani, Paolo and Gino Gancia. 2011. “Trade, Markup Heterogeneity and Misalloc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3 (1): pp.1-13.

③ Barseghyan, Levon and Riccardo DiCecio. 2011. “Entry Costs, Industry Structure, and Cross-Country Income and TFP Dif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46 (5): pp.1828-1851.

④ Midrigan, Virgiliu and Daniel Yi Xu. 2014. “Finance 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Dat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2): pp.422-458.

⑤ Moll, Benjamin. 2014.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Financial Frictions: Can Self-Financing Undo Capital Misalloc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10): pp.3186-3221.

⑥ Galindo, Arturo, Fabio Schiantarelli, and Andrew Weiss. 2007. “Do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Micro-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 (2): pp.562-587.

资源错配的一种因素。David et al.(2016)①从不完备信息的角度讨论了资源错配的问题。他们假设厂商在选择要素投入进行生产时不能完美地观察到价格,而是观察到具有噪声的价格信号。不同的厂商由于观察到的信号质量不同,不能按照真实的价格信号进行最优决策。因此信息不完备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他们基于厂商生产和股票市场的数据对信息结构进行了识别,发现信息不完备使得中国和印度的 TFP 下降 7%—10%。

(二)多部门宏观模型与资源错配

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和行业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宏观经济理论对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此同时,多部门宏观模型也被用于讨论资源错配问题。通过对不同行业/部门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刻画,多部门宏观模型能够较好地分析不同部门间的资源错配问题。例如,Aoki(2012)②基于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说,金融部门、农业和交通是可能发生资源错配的部门,部门间的要素错配导致了 TFP 的差异。

除了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和流动,经济中的不同部门之间还存在投入产出的关系。不同的部门通过中间品的生产和使用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因此,投入产出结构是多部门宏观模型研究的一个重点。一些学者从投入产出结构的视角出发,基于多部门宏观模型对资源错配问题进行了研究。Jones(2011)③在一个多部门增长模型中引入投入产出结构,利用美国、中国和印度的数据进行校准,考察了稳态下投入产出结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投入产出结构将会放大资源错配对 TFP 的负向影响,并且随着中间品所占份额的上升,这种放大效应也随之上升。类似的研究还有 Baqaee and Farhi(2020)④和 La'o and Bigio(2020)⑤等。

Baqaee and Farhi(2020)在多部门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投入产出结构,将 Solow(1956)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推广到非线性情形。在此基础上,他们引入了导致资源错配的楔子,分析资源错配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各部门的技术进步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他们以成本加成为例,基于美国厂商层面的数据进行核算,发现 1997 年至 2015 年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一半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如果将成本加成导致的扭曲消去,加总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提高 15%。相比之下,如果不存在投入产出结构,消除扭曲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不到 15%的一半。因此,投入产出结构放大了资源错配的影响,La'o and Bigio(2020)采用了与 Baqaee and Farhi(2020)类似的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他们引入了弹性的劳动供给。因此,市场摩擦除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还会扭曲劳动供给。这两个渠道一起对经济产生影响。他们基于 2008 年金融危机进行数值分析,发现投入产出结构使得金融摩擦的影响放大两倍。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源错配都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重要原因。通过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表明只要能够有效改善资源错配,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造成资源错配的原因是

① David, Joel M., Hugo A. Hopenhayn, and Venky Venkateswaran. 2016. “Information, Mis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2): pp.943-1005.

② Aoki, Shuhei. 2012. “A Simple Accounting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6 (4): pp.473-494.

③ Jones, Charles I. 2011. “Intermediate Goods and Weak Link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3 (2): p.1-28.

④ Baqaee, David Rezza and Emmanuel Farhi. 2020. “Productivity and Misallocation in General Equilibriu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1): pp.105-163.

⑤ Bigio, Saki and Jennifer La'O. 2020. “Distortion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4): pp.2187-2253.

多种多样的。从微观上看,税收政策、市场垄断程度、市场结构和金融摩擦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生产要素在不同厂商之间的错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从宏观上看,资源在不同部门或者行业间的配置和流动也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部门间的投入产出结构则会进一步放大资源错配的影响。

四、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原因,从而揭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结构。微观层面的企业之间以及宏观层面的行业部门之间即存在显著差异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想提高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分析资源错配的原因和特征。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的导致资源错配的因素制定合适的政策,从而改善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下面结合现有研究对中国的资源错配进行分析。首先,我们将从总体上考察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然后,对资源错配在不同层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最后,分析不同的要素市场的资源错配问题。

许多研究基于 Hsieh and Klenow(2009)的工作研究了中国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龚关、胡关亮①先通过非参数方法估计了行业要素产出弹性,再结合 Hsieh 和 Klenow(2009)的框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核算,同样发现消除资源错配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30%—57%。尹恒、李世刚②进一步放松了 Hsieh and Klenow(2009)的模型假定,同时对替代弹性、要素产出弹性和企业异质性进行结构性估计。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估计结果发现,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空间达到 160%。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通过消除扭曲,缓解资源错配能够有效地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从不同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资源错配的特征存在差异。例如,陈晓光③着重考察了增值税改革过程中不同企业面临的有效税率差别造成的资源错配,发现 2000 年至 2007 年间, 有效税率差异导致年均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 7.9%。朱熹等④利用 2003—2007 年中国农村固定农户数据考察农户生产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对 TFP 的影响,他们发现不同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差异明显,如果能够消除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扭曲,则农业的 TFP 将增长 20%—30%。尹恒、李世刚(2019)的研究发现,地区/省内的资源错配占 60%,地区/省际的资源错配占 40%。由此可见,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地区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对中国而言,造成资源错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下面分别对不同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研究。首先,关于金融摩擦和资本配置效率。对于中国经济,金融摩擦是影响资本要素在不同部门间配置的重要因素。Song et al.⑤在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对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所面临的借贷约束差异进行了刻画,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部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由于国有部门的借贷约束比非国有部门更松,因此信贷资金更多地配置到了国有部门,从而国有部门的资本回报率比非国有部门更低。这表明部门间的金融摩擦异质性造成了中小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信贷进行投资,从而导致了资本错配。

---

① 龚关,胡关亮:《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4—15 页,29 页。

② 尹恒、李世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计》,《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2 期,第 28—44,215—215 页。

③ 陈晓光:《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与效率损失——兼议对“营改增”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第 67—84,205—206 页。

④ 朱喜、史清华、盖庆恩:《要素配置扭曲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86—98 页。

⑤ Song, Zheng, Kjetil Storeslette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2011. “Growing Like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1): pp.196-233.

Chang et al.①在 Song et al.(2011)的模型中加入对金融中介的刻画,他们的研究表明,除了借贷约束程度的差异,信贷政策对于资本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也有重要的影响。

许多实证研究从金融摩擦的角度对造成资本要素错配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邵挺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所有制结构和资本回报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最高,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因此资本要素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错配将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并且消去这种资源错配将使 GDP 增长上升 2%-8%。马光荣、李力行③则从金融契约效率的角度对金融摩擦导致的资源错配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金融契约效率上升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的融资约束。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企业退出市场概率越大。因此他们的研究表明,金融体制不完善也是导致资源错配的因素。张佩、马弘④的研究发现,由于银行系统未实现利率市场化,更容易通过银行系统获得信贷的企业将会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了资本错配。

其次,关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研究表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的配置也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袁志刚、解栋栋⑤构建了包含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对中国劳动力错配导致的 TFP 损失进行了核算。他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错配导致了 TFP 损失区间为 2%至 18%,并且这种负向效应主要来自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差距。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从而降低劳动力错配程度。李世刚、尹恒⑥考察了人才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大量人才配置到政府部门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政府和企业间的人力资本配置偏离了最优配置水平。

除了资本和劳动这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以外,土地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使得与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因素也对资源错配产生重要的影响。李力行等⑦通过实证分析对土地资源在企业间的错配问题进行了考察。他们的研究发现,以低地价、协议出让方式出让建设用地的比例越高,则工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其原因在于以协议出让方式出让土地使得一些高生产率的企业无法获得土地,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却能够获得土地,从而降低了该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罗知、张川川⑧考察了信贷扩张背景下,房地产部门投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房地产部门投资增加将显著地降低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并且将大量信贷用于房地产投资,从而挤出了制造业部门投资,从而导致了资源错配。

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通过降低资源错配程度,能够释放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针对各种导致资源错配的因素制定合适的政策,同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消除各

---

① Chang, Chun, Kaiji Chen, Daniel F. Waggoner, and Tao Zha. 2016. “Trends and Cycles in China’s Macroeconomy.”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30 (1): pp.1-84.

② 邵挺:《金融错配、所有制结构与资本回报率:来自 1999~2007 年我国工业企业的研究》,《金融研究》2010 年第 9 期,第 51—68 页。

③ 马光荣, 李力行:《金融契约效率、企业退出与资源误置》,《世界经济》2014 年第 10 期,第 77—103 页。

④ 张佩, 马弘:《借贷约束与资源错配——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 年第 9 期,第 1303—1308 页。

⑤ 袁志刚, 解栋栋:《中国劳动力错配对 TFP 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2011 年第 7 期,第 4—17 页。

⑥ 李世刚,尹恒:《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经济研究》2014 年第 7 期,第 56—66 页。

⑦ 李力行,黄佩媛,马光荣:《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管理世界》2016 年第 8 期,第 86—96 页。

⑧ 罗知,张川川:《信贷扩张、房地产投资与制造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研究》2015 年第 7 期,第 60—75 页。

种市场摩擦和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为中国经济提供强大的增长动能。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导致资源错配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尽管已有许多研究对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测算、估计和分析,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现有研究主要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中国资源错配问题,缺少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各种导致资源错配的因素进行刻画,因此也无法从理论上对资源错配的来源进行测算和分解,以讨论哪种因素对于影响资源错配更加重要。其次,对于中国资源错配的理论研究还不充分。Song et al.(2011)和 Chang et al.(2016)关注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特征,没有深入讨论金融摩擦和信贷政策对于资源错配的影响。除了金融摩擦以外,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以及国际贸易也是影响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不同行业间的联系紧密,因此有必要将投入产出结构和影响资源错配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讨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除了技术进步以外,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就是要降低生产要素在不同企业、行业、部门和地区间的错配程度。本文结合宏观经济理论对影响资源错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阐明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现有的研究,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在金融摩擦的影响下,中小微企业和农业部门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面对结构性的问题,总量型的货币政策往往不能起到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结构型货币政策加强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样有助于降低金融摩擦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第二,发挥减税降费政策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当中的作用。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减税降费不仅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够有效缓解各种扭曲造成的资源错配。减税降费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减少企业负担,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中国具有相当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投入产出结构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将投入产出结构纳入政策制定的范畴,结合中国投入产出结构的特点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Gong Liutang, Lin Dongjie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he source of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clude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ut also the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s the cause of the los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 way to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s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mis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heterogeneous macroeconomic models.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s economy, and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ucing the degree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 through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provide sufficient impetu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esource misalloc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杨伊佳)